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庄子继承老子学说,开创了我国道家学派。他的学说博大精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庄学汪洋恣肆,内涵极为丰富,对我国历史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价值。

庄子哲学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论,把老子的道生成论发展为道本体论,提出了“通天下一气”的著名命题,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气论奠定了基础。庄子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对性原理,如果扬弃其相对主义的糟粕,相对观念对于破除迷信独断,解放思想,是有效的清凉剂。

庄子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战国中期,他一生不与统治者合作,激烈地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卑劣的人间丑行。他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名言,是对黑暗现实最深刻有力的鞭挞。庄子一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保持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精神。他同情、热爱和赞美劳动人民,在庄子的笔下,屠夫庖丁、木工石匠,都是智慧、才能和道德的化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庖丁解牛》一文,不仅给人们在认识问题概以全面,分析问题善以透彻,解决问题臻以完美之启示。而且,伴随着这种博大精深的学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作为庄子的故里蒙城——一个没有草原的大牧场,其养牛、加工的历史与数量却走在全国前列。诚然,这里面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作为庄子的后人,纯朴善良的蒙城人民正从庄子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其丰富的内涵,从启发中加以总结,全面分析庄子对黄牛的深刻的认识,

继而潜移默化于黄牛的科学养殖、精心加工,致力于小康之路,已在全县城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活动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庄子哲学主要内容是人生哲学。他追求人生自由,他也深知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于是寄望于精神对现实的超越,这是庄子对那个剥削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实所造成的苦难的抗议。在另一方面,庄子也得出了“安命顺世”的处世哲学,这表现了庄子在现实抗争中的无可奈何。庄子幻想通过心斋坐忘,以达到对现实的忘却,心遣是非,行忘物我,这就是逍遥的人生境界。

庄子哲学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今天,评价庄子学说本身的是非似乎已不是我们探求的全部目的,人们在反思社会与自身的同时,更多地是想要从庄子学说中寻求对未来生活的启示。

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政治各种潮流不断地冲击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发展的机遇而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困惑。在这样一种变化急速的时代,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有人一帆风顺,有人身处逆境。庄子人生哲学能够帮助人们从逆境中解脱出来,使人们的心理得到平衡,指导人们在遭受挫折时不要自暴自弃,要善于超越自我,淡化对名利的追求。

庄子哲学的批判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的动力和警世钟。他的民本思想,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庄子的相对主义固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所

创 建 精 神 文 明

中共蒙城县委书记

孫弘文

强调的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相反相成的思想,对于指导人们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作风上的主观专断却是很有补益的。

现代工业文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同时,它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大气污染,自然资源的损坏,生态失衡,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已经预见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负效应,强烈要求人们顺应天道而行,还天地万物以本来的状态。庄子及道家的“道法自然”理论,对于现代环境保护,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自然科学家对庄子哲学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发现庄子学说有许多论述,对现代科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他是在庄子关于“浑沌”的寓言的启示下,才提出了著名的介子理论。西方物理学家丁·卡普拉系统地研究了道家哲学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他在《物理学之道》中探讨了“道”“气”和现代物理学的“场”的概念的相似性。1989年在我们蒙城举行的全国首届庄子学术研讨会上,周翰光先生说得好:“庄子的自然之道——尽管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具体的科技成果,却给人们展现了一条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之路。”

气功,如今已风靡全国,传遍全球。不管人们对气功作何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气功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具有防病治病健全体魄的功用。而在《庄子》一书中,对于先秦气功有丰富的记载与论述,有人还把庄子看作是气功大

师。他的这一部分论述,对我们今天的气功养生学,仍然很有价值。

至于文学、美学,庄子的成就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之冠。著名学者冯契先生说:“庄子被称为天下第一才子,在他那里,哲学就是诗……他把哲学思辩和艺术想象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了,这在中国和世界哲学史上都可说是个奇迹。”张岱年教授说:“庄子的文笔丰美多彩,设喻的奇妙,命词的瑰丽,都超过儒墨诸家,对后世哲学、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说:庄子“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古今无两。……中国自秦以来的重要文学家差不多没有不受庄子的影响。”庄子的审美境界,庄子的风骨,庄子的语言艺术,庄子的批判精神,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着深刻影响,可以预见,庄子的艺术精神将渗透在21世纪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艺术中。

总之,庄子学说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真正的哲学是不会消亡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新时代所拥有的科学手段,利用现代人所必备的辩证思维,揭示庄子学说的深刻的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去其糟粕,继承创新,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为了召开“庄子研讨会”,我们汇集出版《庄子学刊》一书,以此代序,兼向诸专家学者求教指正。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庄周故里九证

蒙城县政协副主席、作家 芦 干

初夏,日本庄子研究学者黑石淳司一行来蒙考察,奉命作陪,参观了庄子祠、漆园故城、庄子钓台、尉迟寺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万佛塔……谈及“庄周故里”,积历年翻阅典籍,学习诸位专家的研究文章,盖有“九证”。

其一,《史记》为证。太史公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司马迁作《史记》,遣词造句十分严谨,而在记述庄周故里时,一句话连用两个“蒙”字,决非偶然,更非笔误,即是说:有蒙又有漆园的地方,或有漆园之蒙,方是庄周故里。蒙城,商称“北蒙”,战国称“漆园”,各地古称“蒙”者,有;古称“漆园”者,也有;但,信史明证(非民间口碑)称“蒙”兼有“漆园”者,仅蒙城一地。

其二,庄子祠堂为证。蒙城庄子祠堂,始建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为祠作记,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竟始作祠堂……”(见《苏东坡全集》)。即是说:庄子故里之庄子祠堂,为王竟始建,并且是王竟在庄周故里当县令时所建。王竟为朝廷秘书丞,掌管文书资料,在蒙城为庄子建祠堂当非草率。苏舜钦“举士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县”。(见欧阳修《苏君墓志》),即是在今安徽蒙城。各地也有庄子祠或“庄子祠记”碑文的,但是,如果王竟并未在其地

当过县令,则该地之庄子祠即非王竟所建,何以为凭?

其三,濮水为证。《史记》庄子传注和《庄子·秋水》篇都记“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水经·渠水注》记之:一(沙)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欠水也。即今之茆河,亦即庄子垂钓之濮水。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常征先生已著文考证,至今未见疑义。今茆河上有庄子钓鱼台及庄子庙胜迹。此钓台离庄周故里即今蒙城县城仅十余公里,故里在钓台近处,合情合理。

其四,文人墨客为证。宋代研究老庄之学者甚众,著名文学家苏舜钦为蒙城县令时建清燕堂,今遗址尚存。大文豪苏轼、王安石等在蒙城均留有咏庄诗文。苏轼作《庄子祠堂记》,王安石留《题蒙城清燕堂》诗。诗中有:“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名句。(见《王荆公文集》)。苏、王二位文豪,位列唐宋八大家,均为一代文学宗师,都为蒙城留下咏庄诗文,视蒙城为庄子故里,哪有考证不确而轻易吟诗作文的道理呢?

其五,皇帝为证。为庄周故里在蒙城作证的皇帝有两个,一是风流天子唐明皇。《旧唐书》有记:唐天宝元年二月,颁诏:号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庄子》书为南华真经。九月,诏命庄周故里即隋山桑更名为蒙城,沿用至今。明皇崇道信道研

道,不可能不证不考而轻易颁诏。二是宋徽宗。据《宋史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帝王录》记:宣和元年(1119年)六月,崇尚道教的徽宗追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大举攻宋。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徽宗禅位后东下,经亳州来蒙城,祭拜庄子。两位皇帝均视蒙城为庄周故里,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其六,出土文物为证。蒙城县文物管理所先后发掘发现有关庄子的石碑七块,尤以宋代苏轼《庄子祠堂记》碑和明代宗伯汪鏊《新建庄子祠记》碑为珍贵。涡河北岸漆园旧址发现有墓碑一块,碑文中有关于漆园旧址的文字。距蒙城仅百余里之遥的颍上和临泉两地,出土两件战国“蒙”字兵器,一为戈,一为剑,二兵器上均铸有阴文鸟篆“蒙”字。当为“蒙”地所铸之兵器,这又为蒙城在战国时期仍有“蒙”地之称,提供了佐证。

其七,从文字学角度为证。蒙城何时始称蒙?宋罗泌《路史》中记“商盘庚自奄迁于北蒙”。北蒙城,即今蒙城县檀城镇,城中巍巍矗立着北蒙山。此地古商都城墙遗址尚存,隐约可见。“北蒙”之“蒙”字,《说文解字》说:“蒙,从二豕,莫红切”。读蒙。《中华大字典》注释说:“凡蒙、覆、童、冡之字,今字皆作蒙,依古当作冡,‘蒙’行而‘冡’废也。”从古籍《路史》到明、清、民国历代《蒙城县志》都明确记载着“北蒙”、“北蒙山”或“殷墟北蒙”,可见,蒙城自商代即称为“蒙”,后历称漆园、蒙郡、蒙县等,唐天宝元年更名蒙城,沿用至今。

其八,从地域文化学角度论证。庄子乃道家学派的宗师。道家文化崇尚自然,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所以庄子才有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的言行。这和信天命鬼神,重人事孝悌的儒家文化大相径庭。按地域文化学来说,道家文化当属于楚文化,蒙城,战国时主要属楚,一度被宋攻占。只有在浓厚的道家文化的氛围中,才能产生庄子这样的道家学派的宗师,如果说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孕育出了道家文化的宗师,似乎有点不合情理。

九,从军事学角度为证。战国时,蒙地处楚宋交界,大部分时间属楚国。楚宋之间,贯穿战国时期,一直征战不休,宋国是北事晋南拒楚。《史记》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重币迎之,许以为相。”留下了庄子“喻牛辞相”的佳话。时,庄子正钓于濮水,当时蒙城一带属楚,楚王派人带重礼请庄子为相顺理成章。若说派人偷偷地去他国聘请人才,战国时虽不乏其例,而携带重礼去敌国甚而越过敌国去聘请“为相”之人,将是一大难事。惠子,宋人,曾在魏为相,后被张仪逐至楚,和庄子为友,两人游于濠梁,留下“鱼乐人乐”之名言。濠梁,今凤阳境内,当时同属楚。两人结伴出游,顺濮水而下,可至濠梁。顺水顺情而顺理。

凡此九证,皆证庄子故里,当然在蒙城,只能在蒙城。《中国名胜辞典》等辞书已有记载。

日本学者颇以为然,表示,将此九证,整理成文,公诸于日本报端。

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

(上接 P46)

七、唐玄宗称《庄子》为真经

“公元742年壬午、天宝、二月,改官名、更州为郡、称《庄子》、《列子》等书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百人。《中国历史大事年表》263页。主编冯君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八、关于庄子钓于濮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

焉”……(下原注:)“濮水音卜,陈地水也,”

《二十二子庄子》卷六《秋水》第十七,52页,郭象子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一版1990年4月4次印刷。

“濮,陈地水名。《水经·渠水注》沙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欠水也,”即今安徽茨河上游。《辞海》地理分册30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8月三版印刷。

庄周故里考证

中国考古学会会员 安徽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 亳州市博物馆名誉馆长

李 灿

研究庄子学术思想不能不了解庄子的生平历史。任何一位学者,其学术思想都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近代思想家如此,推之古人,当不例外。庄子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是酝酿形成庄子学术思想的主要根源。因此,庄子一生都经历些甚么?这是在研究庄子学术思想时,必须要了解的问题。考证庄周故里,知道他生在甚么地方,长在甚么地方,正确的了解他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就比较容易解剖、认识庄周其人,就容易掌握他的学术思想的主流,在研究上就可以避免主观主义的倾向和其他偏见,甚至错误的见解。因此,考证庄周故里,就会给庄学研究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这就是笔者所要撰写本文的目的。

庄周,战国时期蒙地人。出生于周烈王壬子年(公元前369),卒于周赧王乙亥年(公元前286),这年恰好是齐灭宋的一年,计活了八十三岁。

庄周生于蒙地的记载,见于最早的史料为司马迁的《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即魏惠王,公元前370至公元前319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20至公元前302在位)同时。”笔者补充一句,同时的还有一位是司马迁所言“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的楚威王(公元前339至公元前329在位)。

请注意,司马迁在记述庄周故里时,他一连用了两个“蒙”字,一个是“蒙人”,一个是“蒙漆园吏”。这种记事方法表现了太史公写史简而详、和高度的严肃性。这一记载从古至今尚无人提过异议,说明得到了古今史学界、道家及有关

学者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应当作为我们考证庄周故里“蒙”地的首要基本原则。庄周既是战国时代蒙人,故而庄周故里的“蒙”应该说是战国或战国之前就已经有了的一个地名。至于战国或战国以后或《史记》以后出现的蒙地名,除与战国或战国之前的蒙有连带关系的,其余的蒙就没有什么考证的真实价值了。因此,战国和战国之前的蒙应当作为考证庄周故里蒙地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我们还应注意,蒙地有个漆园,蒙与漆园是连在一起的,有蒙无漆园不行,有漆园不在蒙地也不行,因此,蒙地有漆园应是我们考证庄周故里的第三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并非笔者有意制定,它是太史公写在《史记》里的客观事实。假如离开了这一客观事实,考证庄周故里就会走向歧途,陷入迷惘之中。过去对庄周故里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就是离开了这一客观事实。

司马迁作《史记》,书约成于西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它的记事上溯至三代(夏、商、周),下限括秦、西汉(公元前206至前91)早期的一段时间上下几千年,包罗众多,全书融会贯通,是一部最早和最全面的伟大史著。尊重《史记》史实,是笔者考证庄周蒙地的主要立场和观点。当然,这种立场和观点并不是机械的,或者把《史记》以后的史料全部排除开来,相反的还要采取更多的史料来予以补充、说明、证实。因为历史是有连续性、发展性的,不能片面的去研究历史,更不能割断历史。要使它们上下贯通,理据相依,在前史的基础上发挥后史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想也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庄周既是蒙人,蒙在哪里?哪个蒙才是庄周

真正的出生地？古今说法不一。难怪有些专家学者长叹：我爱《庄子》华篇，更爱其人，而至今尚不知道庄子家在何处，岂不哀哉！笔者现就古今较为普遍有影响的庄周故里三说，一一进行分析，追根求源，以正其说。

一、梁国蒙县说。

庄周故里梁国蒙县说，提出的时间较早，影响最大，过去和现代许多学者经常习惯引用的一种说法。这一说法来自《史记》的一些注释家之言。南北朝时期宋人裴驥（音因）作《集解》时，他在庄子蒙人下引用《汉书》地理志云：蒙县，属梁国。唐人司马贞作《索隐》，同样引用了《汉书》地理志云：蒙县，属梁国。又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同时，作《正义》的张守节，他引用了郭缘生的《述征记》云：蒙县（实指梁国蒙县）庄周本邑也。这三位史学注释家对庄子故里的解释都是一样的，即庄子是梁国蒙县人。而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宋国，所以又说宋蒙人也，其实宋、梁是一回事，所指都是蒙县，所以也有人称庄子为宋人，见郭沫若《中国史稿》二册《思想领域中的百家争鸣》。

“蒙县，属梁国”这句话是没错的。问题是这句话用在解释庄周故里得当不得当？与太史公所说的“蒙”是不是一回事？

梁国：汉刘邦称帝后的十一年（公元前196）分原来梁王彭越的领地加上东郡所属的一部分封建为梁国。刘邦封自己的儿子刘恢为梁王，都睢阳（今商丘县南郊）。之后，汉文帝的四子刘揖、梁孝王的次子刘武也都受封在这里。梁国当时辖八个县：下邑（夏邑县）、睢阳（商丘县）、虞城（虞城县）、砀县（砀山县）、蒙县（商丘东北四十里）、甾（音灾）县（民权县部分）、己氏（曹县）、杼（音祝）秋（肖县西）。梁国封地为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属地，宋都也在睢阳。周武王封殷纣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更封纣之庶兄微子开为宋公，为宋国。宋东北四十余华里有蒙泽。蒙泽，泽之名，这里就是西汉梁国所建置的蒙县。蒙泽，《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湣公）十年夏（公元前682），宋伐鲁，鲁生虜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

宫万猎，因搏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者，今若，鲁虜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所指即宋东北之蒙泽，西汉所建置之蒙县也。后，王莽易名曰蒙恩，晋因之称蒙县，荀晞自仓垣徙屯蒙县，置行台，寻为石勒所陷，县遂废。所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汧（音卞）水条有：“汧水又东迳贯（音市）城南。汧水又东迳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汧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蒙县故城在金时圯于黄河故道，今已不复存在。

从上可知，梁国蒙县即宋国蒙泽。这在《归德府志》（归德，即古睢阳，宋置应天府，金置归德府，明洪武更名商邱至今）人物志云：“庄子，蒙人，名周。尝为蒙漆园吏”。注：“蒙，即宋蒙泽，在商邱（市）东北二十二里。”地方志书也说得明明白白，所指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蒙泽。有两点值得考虑，一点是地名的写法上，蒙泽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如果庄周是蒙泽人，司马迁绝不会只写一个蒙字的，因为一个蒙字是不能代表蒙泽的，并也失掉了蒙泽这一地名的意义，这位博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不会把一个完整的名词拆开，把泽字省去，只写一个蒙字，让后人再去推猜、争议，太史公不致于如此拙笨吧！二点是蒙泽也好，蒙县也好，都没有交待漆园在甚么地方，无法园庄周本邑之说。《括地志》说漆园城在冤句县北十七里。蒙泽宋地，冤句古曹国之地，相距甚远，是无法搓在一起的。所以结论是：

梁国蒙县即宋国蒙泽，并非庄周的蒙地。

二、山东东明新说

庄子东明县人新说始于一九九五年，首见山东《大众日报》，题目《庄子故里研究有新发展》，副题《全国庄子研讨会综述》。1996年元月17日《文汇报》，题目更为明显：《庄子故里在山东省东明县》。事隔数月，《光明日报》5月14日又发表了题为《庄子故里在东明》、副题如前《全国庄子研讨会综述》的短文。文章中介绍了东明县有关的庄子遗迹，如漆园城，庄子垂钓的濮水，庄子观，庄子墓，庄寨，南华山等等，因此说庄子应是东明县人。不过文章最后写的还是比

较客观、尊重历史事实的,提出了东明县是不是蒙地,尚无史据。尤其《光明日报》明确指出:“关于庄子蒙人的蒙,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否属于蒙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术方面探讨、研究还是应当允许的。

东明县原在河南省兰封县(今兰考县)东北二十里处,故阳武户牖(音酉)乡。汉置东昏县,王莽易名曰东明,晋省。宋复置东明县,金时圯于黄水,遂移治于河北离狐县故地,治所在今东明县南三十里东明集,称为南东明县。明洪武初徙治于云台集,遂废,称为西东明县,在今县治西十五里。弘治年间复置县于大军集,即今之东明也。清属直隶大名府,现属山东菏泽。东明所在之离狐县,亦汉置县,初治在濮水南,因闹神狐穿穴,移治于濮水之北,故名曰离狐。唐时置有南华县,因南华山而名,金时亦为黄水淹没,故城在东明之东北。东明边境还有一个故城,即吕都,汉置,为吕后封吕台为王之地,后汉废。从地理史料上看,东明并非蒙地,也无称过蒙的地方,庄周故里在东明,因缺乏蒙地的依据,尚无法成立此说。

三、北冡(蒙)说。

北冡,即今日安徽蒙城县,此说由来已久,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公元742)二月册诏庄子尊号南华真人,《庄子》曰《南华真经》,九月废隋之山桑县名,诏置蒙城县。北宋著名学者苏舜钦(1008—1048)知蒙城县时,于官衙后建清燕堂。著名变革家王安石(1021—1086)为清燕堂题诗曰:“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宋元丰元年(1078)秘书丞王竞任蒙城县令,建庄子祠于漆园城旧址,大诗人、文学家、书法家苏轼(1036—1101)为蒙城县庄子祠撰《庄子祠堂记》,勒之以石。可见自唐宋以来庄周故里北冡已被官方和学者所重视。

笔者过去与一些学者一样,说庄子故里在蒙城县是不敢认同的。理由是蒙城县于天宝元年建置,而庄子是战国时蒙人,前后相距一千多年,所以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近些年来,由于考古学研究,对涡水古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如

它的原始社会文化情况,古民族的分布,夏文化的关系,商民族和汤都亳的考证,特别是道家哲学思想的起源、关系到老子、庄子故地的问题。这些都属于笔者晚年以来研究的重点。庄周梁国蒙县说是笔者过去一贯的观点,但是通过较长时间的探讨,感到很不踏实,甚至存在不少模糊的地方。因此,发现了庄周出生地另外还应有个“蒙”地,这个蒙在甚么地方?这才迫使笔者再回过头来对蒙城县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并对它进行追根求源的探讨。

蒙城县,汉置山桑县。东汉,绿林军首领王常因光复汉室有功,被汉光武封为山桑侯,为侯国。东晋置谯郡蒙县,南朝宋复置山桑县。北魏建置涡州,并建涡阳县为州治。梁置西徐州,北魏又置谯州,东魏置蒙郡,北齐为蒙县。隋先置肥水县,又改置山桑县,直至唐天宝元年诏置蒙城县至今。

据考,蒙城县在商殷时就称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蒙地。古时写作“北冡”,“北冡”合起来就是后来写的“蒙”字。故《康熙字典》说:“冡与蒙通”。北冡按甲骨写法,北为“𠂔”,二人相背而立之状,原“背”字也,北字乃背字的借声字。冡原为“𠂔”,或“𠂔”,其形状上面是个棚子,下面饲养家畜,指奴隶们放牧饲养牲畜的意思。殷时有官曰冡宰,就是专门掌管奴隶放牧、饲养家畜供祭祀事务的官。据宋庐陵罗泌著《路史》,其中《国名记(丁)》所载,“商氏后,蒙。纪年盘庚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属沛后又属汝南),天宝二(实为元年)改”。按罗泌所考,北冡是殷盘庚自奄迁都之所,称为殷墟。又称景亳、汤都。景,景山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汤伐夏桀前,与天下诸侯盟于景山,称为景亳,汤建国前之所都地,故称汤都。景亳是否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只要到过这里的人都会知道,自商邱(宋州)朝北直达唐州,平原一望无际,那里有景山的影子?可见《括地志》所言谬矣。笔者认为北冡山即景山,景山也就是北冡(蒙)山。北冡山、景山现仍巍巍屹立于淝水之阳,北冡

故城中，山高七十丈，周三里许，峰峦耸秀，远视若芙蓉，蔚然壮观。所以罗泌说，北冢就是景亳、又称蒙亳，殷墟，汤都，是有道理的。现在既证实蒙城自殷商以来就称蒙，而且了解了蒙字的原意：一曰商民族放牧之地，二是景亳，汤之蒙亳、所都也。

罗泌所著《路史》四十七卷，前人对其评价

极高，言此书远涉皇古，多采纬书及道家之言，不免庞杂，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其国名记考证尤精核。该书的史学价值由此可知。所载盘庚迁北冢，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笔者按即《路史》所指奄，在黄河以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迺注（乃）五迁，无定处”等语是相吻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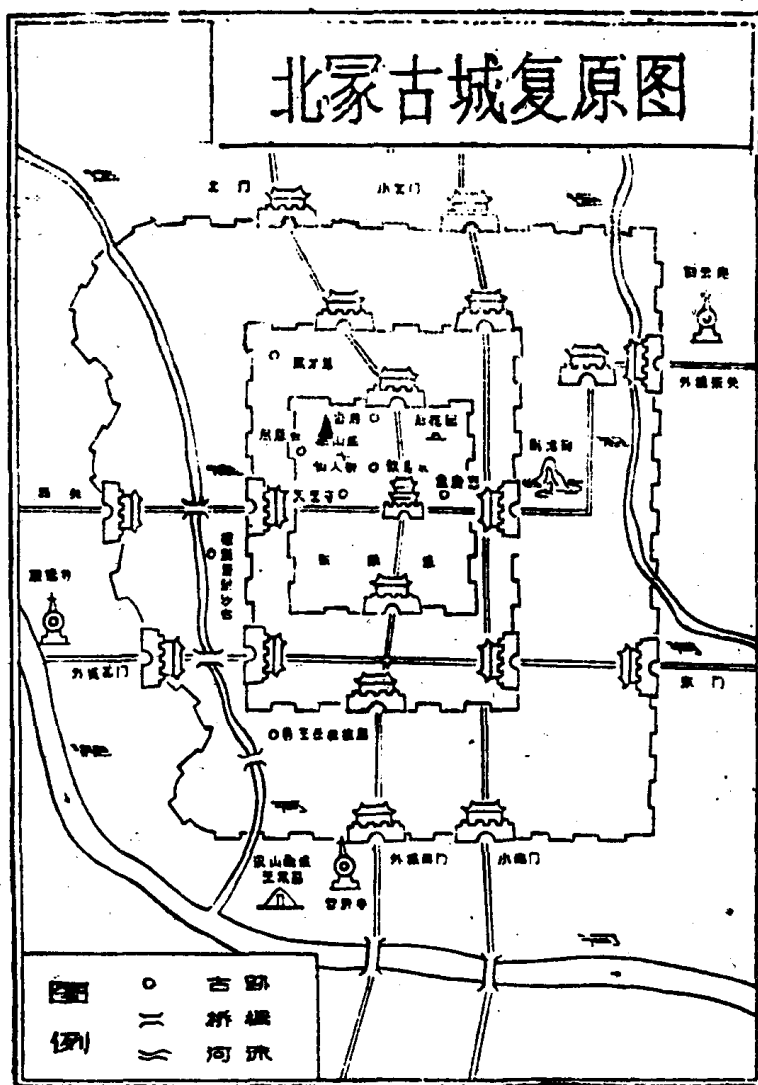


图1 北冢故城复原图

北冢故城位于今蒙城县北四十华里，内城环冢（景）山而筑，为不规则的横长方形，东西580米，南北460米。中城廓为南北宽于东西。纵长1200米，东西880米，横断面有的仍高出地面数米。外城廓南北6400米，东西8800米，

其势磅礴，无愧于京畿。然而，自盘庚至汉经历了一千多年，这里没有搞过重要建置，不免被蒙上了一层历史的灰尘，或遗漏于史册。汉置山桑县，后汉为侯国，载于汉史，始为有名。所谓山桑

之名,取意“邑中有山(指蒙山”,庭中有桑(原山四周皆桑树)”,故名山桑。山桑之名从而取代了北蒙的“蒙”字。到了南北朝时,南宋檀道济奉命率兵北伐魏,后因粮尽退兵至山桑,被魏军所围,道济以城中土台作虚粮之计,以夜唱筹量沙,智退了魏兵,宋为记檀功,又将山桑易名檀公城,人们俗称檀城,流传至今,现代人只知其地叫檀城,然其地古蒙三千多年的历史就更鲜为人知了。周代,北蒙仍称蒙,地名没变。不过在这漫漫八百年岁月里,西周和春秋初期,周室和各侯国还均有史官,以纪年记事。然而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期间,各封国之间都是以刀枪相见,拼杀无度,将史官弃之,丢掉记史之事。由此可见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之困难,他检阅前朝各国各家遗著遗史,集零散记事以系统整理综合而成。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博览万卷群书,遍历山川,撰写成这部巨著。所以在写庄周故里时,只言庄子“蒙人”,而不言于国,不言于县、不言于山、泽,是恐后人不解其意,故又在漆园吏前再加上一个蒙字,可谓详而精矣!其人治学之严谨,用词之谨慎,简中以求明,用心之细可窥见一般矣!然而仍不免被后人指鹿为马,诸多误解,又怎能怪太史公“语焉不详”哉!(图1、北蒙故城复原图)

北蒙在漫长的八百年中,经过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几个时期,地属何国?确实是一个难以言之而又颇为复杂的问题。周初,中国的奴隶社会已发展到后期,实行了带有封建萌芽色彩的分封制度,当时受封的大小诸侯国一千多个,并出现了乡、县级行政机构的城邑。这些城邑当时都是战争工具,为军事防御而筑的。这些诸侯国以大吞小,以强凌弱,到了春秋时期,知名者不过百余国,并出现了势强的十二诸侯国,说明当时国与国之间互相争夺并吞之剧烈。北蒙在动荡的几百年里,处于群雄争霸的战火之中。按《蒙城县志》云,到了楚考烈王三十年(公元前253)方为楚国北地,明确了北蒙的归属时间。但这时的楚国已由强转弱,被迫从其第二国都陈(河南淮阳)东迁于郢(界首市光武集北三里),不久即迁都钜阳(又称细阳,太和县东北原

墙集),这时庄子去世已三十多年矣。楚考烈王都钜阳十二年,于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再迁都寿春(寿县),居寿春十九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又过三十年,秦统一天下,战国结束。据笔者考证,北蒙归楚疆时间还应早于楚考烈王,应在楚顷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就是庄周逝世的那年。齐灭掉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沛即所指汉沛郡所属范围,北蒙当在其中。

在这之前的北蒙,自西周至战国早期,曾先后为徐、宋、楚、吴诸国的属地,其中属楚的时间应比其它诸国要多的多。西周时,徐是东方的大国,成为东方淮夷等诸夷的盟主,并曾与周室抗衡,受到周人的多次征伐。春秋早期,齐国成了东方霸主,十分强盛,笔者认为北蒙这一段时间先属徐、后归齐。齐桓公死后,宋欲继齐称霸,疆域不断向东发展,直达到了彭城(徐州市),北蒙很可能又属于宋国范围。然而崛起江汉的楚国,也开始向中原侵犯。公元前639年,宋召楚盟,楚执宋襄公于亳(亳州北境),次年冬败宋襄公“仁义之师”于泓水(水出商邱,柘城之间,至亳入涡),襄王病伤而卒。之前楚就伐许,灭元、英诸小国。不过在公元前623年,楚成王与晋文公城濮(河南濮县)一战受大挫,从而矛头由北转向东之江淮。公元前618年伐陈,灭舒、蓼。公元前599年灭陈,从此陈遂沦为附庸,陈东之焦(亳州)、夷(城父)归楚有。公元前595年,楚再伐宋,围宋数月,这就是《蒙城县志》所载的,楚庄王遣庄跻伐宋,回师瑕坡(淝水自北蒙东流不远,积水为坡,称瑕坡),筑瑕城(城在坡东,故城犹存,在蒙城县东北四十里乌集)。这当是北蒙为楚占领之始。也是楚在北蒙建立的第一座军事城堡。公元前590年,宋共公将国都自宋(商邱县南)迁到相(淮北市相山脚下)。公元前573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徐州市),以封宋之右师鱼石,次年,诸侯共诛鱼石,归彭城于宋。

吴国(江苏吴县)本偏处江南,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国势强大,势力向北发展,晋国为削弱楚在中原的竞争势力,遣巫臣诱吴伐楚,并

教吴以陆战方法,开展了吴楚战争。公元前574年楚灭舒庸。公元前570年,楚夺吴之鸠兹(芜湖),进攻朱方(凡徒),以诛投吴的齐相庆封。是年,吴伐楚,取楚棘、麻、栎三邑,以报朱方之仇。按棘在今河南永城县酈县城东北,麻在今砀山境,栎在今河南新蔡县,棘、麻本宋国之地,被楚所占领的大片土地(包括北蒙)均为吴所夺,当然时间不会太久。公元前531年,楚遣荡侯围徐(泗水县南),楚灵王居乾谿(亳州城父南七里)以待之。灵王于乾谿筑章华台,又名章华宫,细腰宫,娱乐不能去。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又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城父东南有下城父,相距不过四十多华里,其地已接壤北蒙矣。吴灭徐,徐子奔楚之城父。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越无力正视江淮以北之地。楚灭蔡(北蒙南境,今凤台县),楚之势力范围直达泗上。吴楚之战,以吴亡而告终,这时已进入战国初期,东方大国齐也南侵占据淮北大片土地,然而北蒙仍陷于齐、楚、宋争夺的边缘地带。不过,不久北蒙就比较更多的属于楚的势力范围,并趋于稳定,到了后期就成为楚国的北疆。在这几百年中,北蒙不是封国,没有建置,所以司马迁写庄子是蒙人,而无法言其县邑或国名,这个论点,笔者已经反复重述。

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各霸国的边防军事设备都是很严谨的,有的筑起长城,有的于险隘地方设关卡,并筑起烽火台以报警用。但在平原地带是怎样设防的?笔者于50年代初,执教于城父,被城父众多的文物古迹和楚国遗留风物所吸引,在这里做了数年访古探幽,成为一生从事考古生涯的开端。其中令人难忘的就是城父南乾谿沟边楚灵王筑的章华台,这是灵王屯兵之处。在章华台东南十几华里发现了当年所筑的烽火台遗迹。其中高堡(音卜)东的一座,笔者当时看时尚有七、八米高,用生土力筑四方形的台子,群众叫狼烟台,说敌兵来了,台上就放起狼烟,楚王在城父就知道了。由于当时我没有照相机,楚国这一重要风物未能得留下来,现在尚十分遗憾。城父东南40里就是下城父(今涡阳),这里与北蒙接壤,后来下城父曾属于蒙。

就在下城父之东,楚设一关卡,名曰“蒙关”,至今名称未改。蒙关西有蒙关驿,今名蒙关店,这是当时的重要关隘。只是没有留下名人名故事,不像伍子胥过昭关的昭关名扬四海罢了。然而,蒙关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北蒙留下的唯一带蒙字的地名了。

关于漆园,有称漆邑、或漆园城的。能够见于史书的计有四处。庄子为蒙漆园吏者只能有一处,今述于后,以辩正之。一梁国蒙县之漆园,见于《水经注》汭水条,前文已引,该条只言为蒙漆园吏,又“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问题很清楚,该条中只言漆园而没有指出漆园到底在甚么地方,此为虚言,说明蒙县并无漆园,当属“想当然”之文也。至于惠施生年不详,卒年是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这时楚威王已逝世十九年矣,庄子也年近花甲,早已不是漆园吏了,又怎能以漆园傲吏悼于此呢?惠施死后,庄子悼念好友在乎情理之间,但不在蒙县,而在北蒙,这又是将蒙县误作庄子家乡北蒙明矣。二冤句县之漆园城,此说见于《括地志》,言“漆园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此漆园城也就是东明县所说的冤句县北七十里属于东明境的漆园城,十七里也罢,七十里也罢,但都不是蒙地的漆园,更不是庄子为吏的漆园。按冤句与蒙县一样,都是汉置县。冤句古称宛胸(胸音曲),《史记》有云:“黄帝得宝鼎,宛胸是也”。汉景帝封楚元王子执为冤句侯,即此地。宋朝更名为宛亭县,也是金时圯于黄患。冤句地在山东菏泽之西南。冤句北之漆园城,为古宛胸地之漆园城。故非蒙地的漆园,与蒙毫无关系。三定远县之漆园,在今安徽省定远县东三十里,现名叫堽畝。漆园虽古,与蒙无关,姑且勿论。四北蒙之漆园,也就是《史记》所言蒙漆园吏的漆园。其遗址叫漆园城,地理位置在北蒙故城之南,汭水之南,涡水之阳数里。城址不大,呈纵长方形,南北345米,东西280米,总面积96600平方米,旧城墙高出地面,尚清晰可见。旧城内尚可发现战国遗物。按《蒙城县志》载,漆雕氏食邑于北蒙,因名漆园,漆园城,庄子为吏之所。宋熙宁、元丰年间,任蒙

城县令的秘书丞王竟，在漆园城旧址中建庄子祠堂一座，由苏轼撰书《庄子祠堂记》碑。该祠后毁于黄水，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中都太守张登云命知县吴一鸾于蒙城东关庄子故居处重建庄子祠堂，原苏轼《庄子祠堂记》碑重树于新祠。该祠后毁于战火。庄子为蒙漆园吏之漆园，当在北蒙，别无选择矣。

对于漆园这一地名名词的来源，过去许多学者都解释为漆树之园（即漆树林子），其理由因史书上载有关于豫州有贡漆或曰漆利的记述。按此解释庄子就是管理漆树园子的官吏了。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是不妥当的。翻开史书，中国实行官利或曰官榷最早的是铁、盐，后来又加上一项酒榷。就是说这些是国家经营、统一管理，专利是属于国家的，与我们今天专卖机构同样性质。官榷始实行于汉代，战国时根本没有这种政策，何况又是漆树林子呢。因此，说庄子是管理漆树园林的官吏是解释不通的。所谓漆园，《蒙城县志》说的很好，即因漆雕氏食邑之地，故名曰漆园，或曰漆园城，或曰漆邑。漆雕氏，又单姓漆，夏防风氏之后，为周所封国，国名酈。酈，东夷诸国之一，称为北夷，又称狄、长狄，在今山东省历城县北。按《春秋左传》记载，宋武公时（公元前765—前748），酈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皇父，戴公子光石。这一仗败酈于宋地长丘，获长狄绿斯，归顺宋后，令其食邑于北蒙，为漆邑，大概漆氏后来作乱，所以《蒙城县志》有宋襄公伐漆邑的记载，其一说也。漆氏部落首领绿斯之后人侨如，其弟荣和，因伐齐、鲁、均被获，侨如季弟简如逃至卫，为卫人获杀，酈遂亡国。笔者认为酈漆氏亡国后，其族人流亡曹国，曹令食邑于宛胸之北，是后所谓冤句北十七里之漆邑。宋灭曹后，宋又徙漆雕氏食邑于北蒙，即将宛胸漆雕氏迁至北蒙，故《蒙城县志》又有宋灭曹后，迁曹国漆雕氏食邑于北蒙。此为第二说，二说或可兼并有之。但总之漆园之来源，北蒙漆园之来源，是漆姓氏族食邑之地也。

庄周，生于蒙（北蒙），约在二十岁后至三十岁之间，即楚宣王至楚威王时间内曾做过暂

短时候的蒙漆园吏，以后便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庄子是一位出身破落贵族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按庄姓，本出自楚，为楚庄王之后。庄王以封谥为姓。公元前595年率楚军攻宋，后回师北蒙以筑瑕城的庄跻就是楚庄王后人。为北蒙庄姓之始，笔者认为庄周也是庄跻的后代。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有可能被楚国任命为管理漆氏族食邑漆园城的官吏。看来庄子年青时就才华四溢了，二十多岁出任漆园吏，在四十一岁之前，就被楚威王差人重金相聘，请他出任楚国的宰相。这就是《史记》上所说庄子隐居后垂钓于濮水的一段故事。濮水，东明县说流经东明县境，这是不错的。不过在战国时期，称濮水的河渠并非东明一处。《水经注》卷二十二《渠水》、《沙水》部记有：“沙水又东分为二水，即春秋所谓夷濮之水也（夷、城父原称）。枝津北迳谯县（亳州）故城西侧入涡。沙水东南迳城父西南，枝津出焉，俗谓之漳水也。一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父水也，东迳城父县东南流注之。又东南过山桑县北（按应为南，北误字也）”。古沙水又名濮水，因城父濮夷之田故，两千多年，河流千变万化，濮水下游大致没动，唯上游与茨河沦为一体，故今名之茨水。茨水，古细水，楚考烈王居细阳之都也。现位于蒙城西南二十五华里吕望集之濮水边，有庄周钓鱼台遗址，即楚威王使者聘周地也。五代时的道家陈抟，慕庄周之名，也曾隐居于此，留有诸多古迹。按东明县所说濮水，属于曹国西部，与卫国之间。这时这里尚无东明，亦无离狐。并且曹已亡于宋，不知楚威王的特使是如何通过宋都及宋全境，而到达宋卫边陲濮水的？更不知在濮水何处寻到庄子钓鱼地点的？众所周知，宋、楚争霸以来，宋在军事上一直奉行着亲齐联魏抗楚的战略决策的。长期以来宋、楚都是处于敌对状态，宋也因这一战略才得以生存。宋自微子共二十余世，至景灭曹，又五世君偃立，君偃把其兄剔成赶下位，剔成投奔了齐国。这位君偃自立为宋主后，一改祖宗既定的战略决策，与齐、魏为敌，东败齐，取五城，西败魏，南败楚，取地三百里，结果召来亡国之祸，而被三分其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楚使臣是根本无

法通过宋境的。庄周垂钓之濮水，只能是从城父东流，经过北冢地的濮水。也就是蒙城县西南二十余里吕望集庄子钓鱼处，楚威王遣使拜聘处也。

庄子出生地蒙，及蒙漆园经大量史料正于北冢。近年，在考古学方面，对北冢的考证也获得了大量的重要实物资料。在北冢故城发现了商代遗址，散布着大量绳纹陶片，捡到的有陶纺轮。（图2、陶纺轮拓片）在外城淝水之阳，发现一处遗存丰富的文化遗址，今人称为山桑侯墓、或芮集孤堆，文化遗存自商，龙山、至大汶口。沿淝水而下，又发现了尉迟寺古遗址，规模之大，文物之丰富，被誉为独具皖北大汶口特色的中国原始第一村。尤其在北冢城内，及北冢故城西南二十多里的小涧地方，都先后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次出土的青铜器，除一大部分流失外，现蒙城县文管所尚收藏

有几十件，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带有铭文的器物，无法进一步考证其氏族国别，但可断言，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的殉葬物，但从史料可知在这一时期居住于北冢的贵族，一是曾建过酈瞒国的漆雕氏流亡氏族，一就是庄跻楚国的大贵族。这一发现，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必将为北冢的考古提供重要线索。在北冢故城及漆园城旧址内，普遍发现的有楚国铜贝，俗称蚁鼻钱（图3、铜贝拓片），说明进入战国之后，这里基本上为楚国辖区范围。尤其在蒙城县附近的古蔡地，连续发现了带“蒙”字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其一为青铜蒙字戈，戈通长24厘米，援长15.5厘米，内长8.5厘米，胡长10厘米，阑长11厘米。“蒙”字位于胡的部位。蒙字体形悠长，笔划工整有力流畅；字形如龙头凤尾，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典型虫鸟篆体书法。该戈发现于临泉县（与蒙城均属阜阳地区）。（图4、铜戈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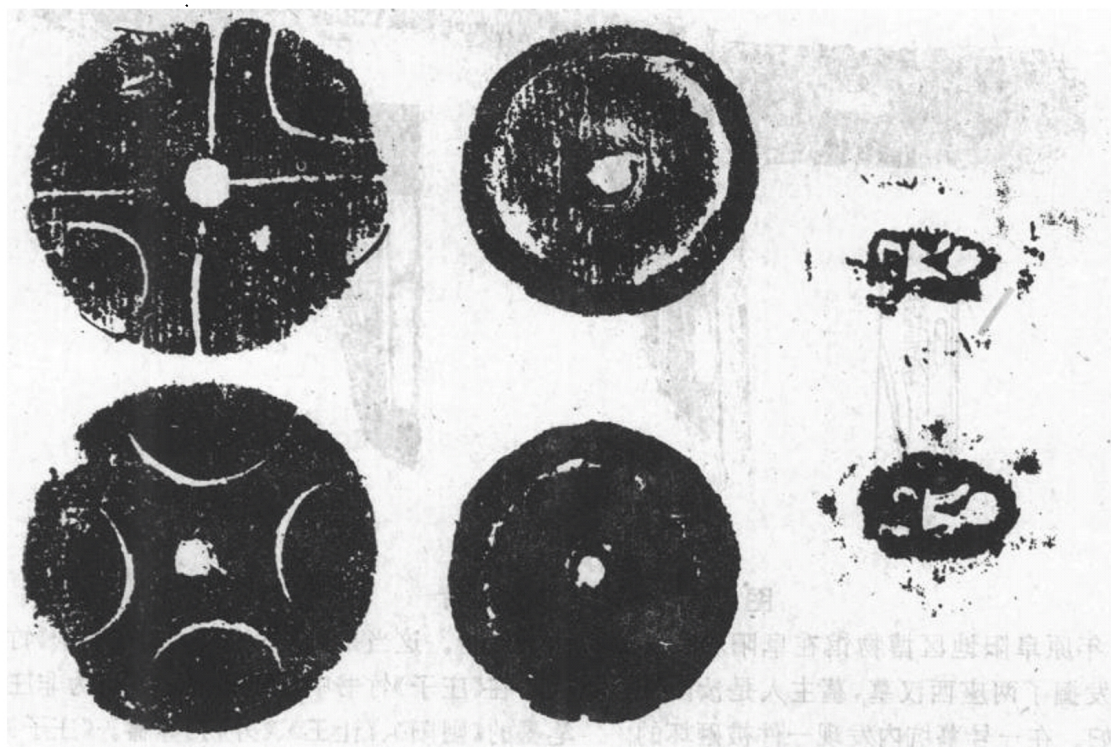


图2 陶纺轮拓片

临泉，因城临泉河而名，春秋时为沈子国故城，故名沈丘。《春秋》定公四年，蔡灭沈，成为蔡

图3 铜贝拓片

地（上蔡）。临泉，又名寝丘，为楚国名相孙叔敖之子的封地，又为楚地。二是青铜蒙字剑，剑残

仅存一段，长13.3厘米，全长度不明。宽3.8至4.2厘米，断面呈菱形。“蒙”字位于剑身一侧，竖写，与铜戈上的“蒙”字无论是字的形体、书写方法均完全相同。该剑发现于颍上（与蒙城均属阜阳地区）。（图4、铜剑拓片）颍上，又称颖尾，楚之慎邑，《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下蔡，今凤台县），次于颖尾。以上两件“蒙”字兵器，经上海博物馆专家鉴定，确认为蒙字无讹。笔者认为：一、从两件兵器上面蒙字字形确认，这种龙头凤尾的虫鸟篆体写法，仅流行于淮

北一带，与其它地方战国时间篆体的写法是不同的。二、蒙字戈与亳州市柴家沟战国楚墓出土的铜戈进行比较，除了戈的援部稍弧一点，其余大小形制完全相同，因此这两种蒙字兵器，都是楚器。三、两件蒙字兵器虽然一发现于上蔡，一发现于下蔡，然字体相同，应属于一地所造，也就是造于蒙地，说明北蒙在战国时为楚地，仍称蒙。很可能与蒙城小涧近年出土的大批战国青铜器有关。当时作为兵器流散于楚之慎邑和寝丘也是很自然的事。



图4 铜剑拓片、铜戈拓片

1977年原阜阳地区博物馆在阜阳城西南郊双孤堆发掘了两座西汉墓，墓主人是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在一号墓坑内发现一件被砸坏的竹简，简内全是挤压成块，又朽如木板般的竹简。这批珍贵国宝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专家们利用现代科技方法，经数年的努力，终将竹简剥离开来。在这批被拯救出来的竹简残片中，就有《庄子》一书。可惜残简不多，但也属

凤爪麟角。这当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庄子》竹书了。在《庄子》竹书中发现就有后人认为非庄子笔墨的《则阳》、《让王》、《外物》等篇。《庄子》竹书的发现，对庄学研究不能不算是一重大事件。（图5、《庄子》竹书）

汝阴，古胡国，今之阜阳市。古时介于上下、蔡之间，与北蒙接壤，同是楚国北地。汝阴侯是汉刘邦对开国功臣夏侯婴的封号，汝阴即夏之

封地。夏侯婴，沛人，北蒙汉时属沛，可以说庄子与夏侯婴都是同乡。说不定《庄子》遗著会落在夏侯婴手中，起码也应理解为是最早《庄子》竹书的抄本。汝阴侯夏侯婴卒于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其子夏侯灶继爵位，仅过了七年（公元前165年）又逝。此时距庄子逝世才不过百余年，如按汝阴侯生前得《庄子》竹书时间推算，距庄子逝世仅几十年时间，无论如何不能说此书与《庄子》原著不无密切关系。何况又出之庄子故人故地墓中，其研究价值是无法低估的。对庄周故里北蒙的考证，不能说不是又一力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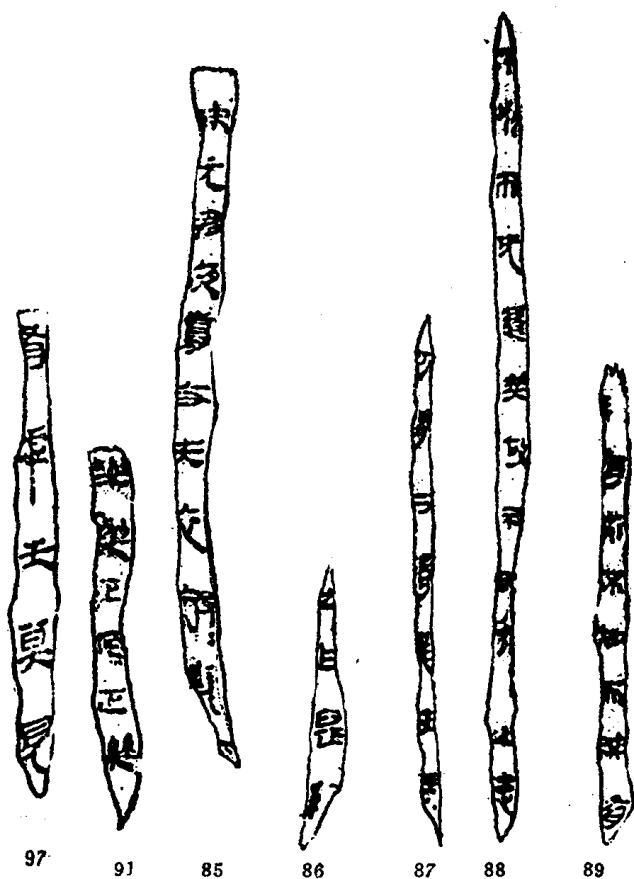


图5 《庄子》竹书

庄子一生写了多少篇书？至今无人知道。仅按《汉书》言五十二篇。西晋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却只有三十三篇了。且分为甚么《内篇》、《外篇》、《杂篇》，到了元代，吴澄提出庄子的《外篇》、《杂篇》都不是庄子所作，明清王夫之也认为《外篇》、《杂篇》非出自庄子笔墨，他们的这些

怪说影响后人很大，而又很坏。照他们之说《庄子》一书中还有多少真货？研究《庄子》还是苏东坡先生在他撰的《庄子祠堂记》碑铭一文中说的好：“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不辩。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故我们在读《庄子》时，不能受甚么《内篇》、《外篇》、《杂篇》的约束。还要明辨真假辨清《庄子》书中那些所谓道学先生所掺杂里面的砂子。现在以汝阴侯墓出土的《庄子》竹书、后人所谓《外物》篇为例，原竹书：“乃剝龟七十二兆而无遗笑，故神”。看今本怎样写的：“园剝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笑，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本来这段文字是指占卜而言的，占卜时先取龟之腹甲，经钻、凿、灼，然后看甲背因受热后炸裂出的纹理，预卜结果，叫做兆。原竹书仅十二个字，而今本则三十字，比原著竟多出了十八个字。这本来是庄子说的话，后人改的今本却成了“仲尼曰”了。原著何等精练简捷，而今本则是累牍厌人。借此略陈今本《庄子》一书存在的谬误，以醒世人。最大的遗憾，汝阴侯《庄子》竹书，残毁的太多了，抢救出的太少了。虽然太少，然还不知熬费了考古科技人员多少心血呢。

近年，在北蒙漆园城的考古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除对漆园遗址的考察，和发现战国楚贝外，1990年春夏之际，漆园城旧址东北角的刘寨村村民，在距村北约100米处打井时，挖出一块方石碑，被县人大视察团发现，动员村民上交给文物部门。石碑系清进士出身选庐州府舒城县训导葛锡祚夫妇合葬墓志铭。志文是岁贡生葛立德撰，墓志开头云：“维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辰时，堂侄书忍卜葬先考、妣于漆园城东北新莹，索余为志”等语，这一墓志的发现证实漆园城自古有之，与我们今天考察的地理位置相附合。说明蒙漆园的存在。（图6、墓志拓片）前面已讲宋燕宁、元丰年间秘书丞王竟出任蒙城县令时，于漆园城旧址建庄子祠，并请当时著名学者苏轼撰文《庄子祠堂记》，以勒石。苏轼撰文时间是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十一月十九日，时苏轼四十三岁，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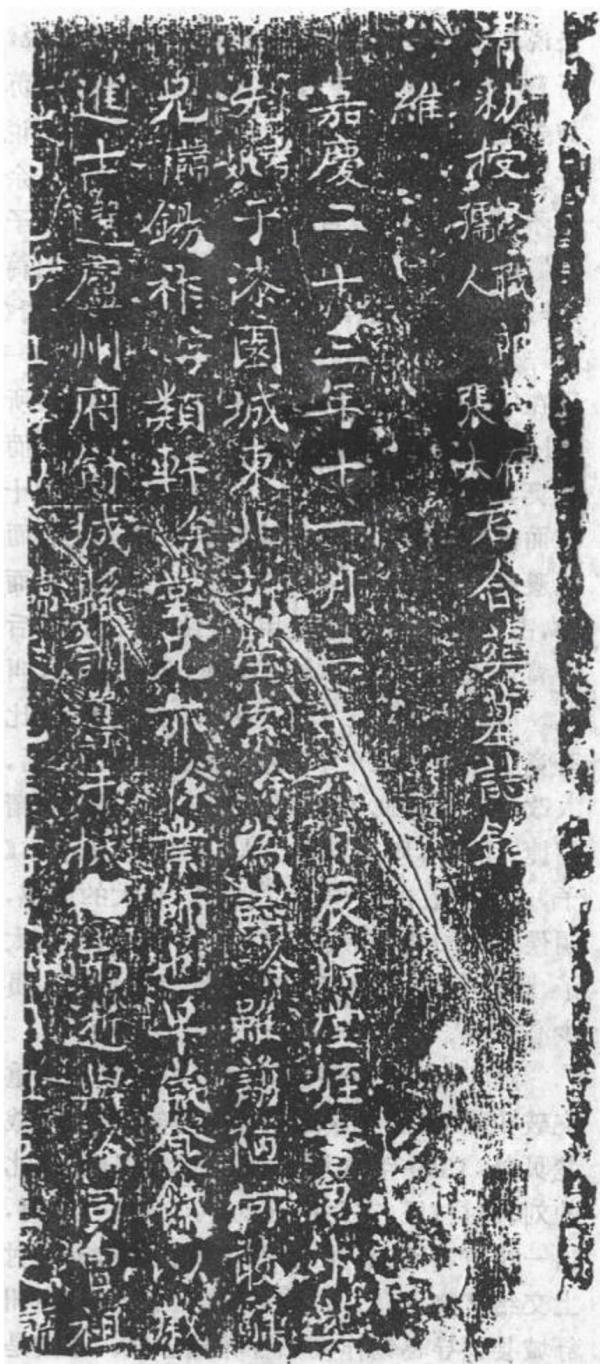


图6 墓志拓片

在徐州知府任上。这块著名石刻，后屡经水患、战火已被湮没。不料苏轼此文碑九百年后，于1980年8月在蒙城庄子祠遗址出土，再重见天日。出土时，虽然碑已不完整，上半截残去，但尚存文字186个。所存文字与《蒙城县志》、《归德府志》所载《庄子祠堂记》碑文相同。证明了蒙城县令、秘书丞王竟于蒙漆园城建造庄子祠这一事实。（图7、苏轼《庄子祠堂记》碑拓片）

通过近年考古发现，对庄子生地的蒙，及蒙漆园的地址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实物依据，进一步弥补了史料之不足，以正庄周故里在今之蒙城。

北冢的归属，以及庄子的国籍等问题，前面已作交待，关于汉刘向《别录》所说庄子为“宋蒙人”之说，笔者还有必要交待几句。笔者并不反对“宋蒙”说法，但坚决反对“宋人”说的。刘向在这里所言之蒙，是暗昧不明的，如果所指的是北冢的蒙，在春秋时期，是与宋国有段归属瓜葛关系的，如宋襄公伐漆邑，宋灭曹后，徙曹国漆雕氏食邑于北冢，这些史实都说明宋与北冢的当时的关系情况。所以“宋蒙”可以为说。但涉及庄子，北冢在战国时基本上就与宋没有了关系，绝大部分时间是属于楚的，所以庄子并非宋人。如系宋人，太史公为何以一字之差，让后人费解呢。如果刘向所言蒙是指“蒙县”，该论实与郭缘生、裴翊相同矣，即“梁国蒙县人”，也可说“宋人”了。那么请再回过头来，重新翻阅一下《归德府志》书，上面记载有关庄子故里一共有三处：一、《归德府志》卷二十二《人物志》云：“庄子，蒙人，名周。尝为蒙漆园吏，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谨按《汉书》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窃疑周非宋人，然今府南二十里有小蒙城，旧志云即庄子本邑，我姑听之。”（图8，府志卷二十三）二、在《归德府志》卷首舆地图，绘庄子故里在考城东北处，图上标地名：“古蒙泽，庄周生于此”。再查商邱近年编写出版的《商邱名人名胜》一书，言庄子故里在商邱市民权县顺河集东北三里的清莲寺村，又名庄子胡同。所言地理位置与舆地图所标相符。该处现存遗址有庄子井和庄子墓。按民权县，古之考城，民国时改考城为民权，原所属西部划归兰考。考城，春秋时为戴国，后为宋所灭。杜注：戴国，陈留外黄县，东南五里即考城。考城乃春秋时戴国之地，非蒙也。又蒙泽本在宋城东北四十里，何时又迁移到西北戴国了呢？牵强附会明矣。三、《归德府志》卷三十二《古迹》云：“小蒙城在府南二十里，即庄周本邑。又城北四十里有大

蒙城,旧府志”。现仅就《归德府志》一书就讲了庄子故里有三处,何处为是?然而书中对这三处庄子故里所抱的态度则是怀疑的怀疑,推翻的推翻,附会的附会。孰说为是?真是一笔无法弄清的糊涂账!且按府志卷二十二、卷三十二所说吧,庄子本邑在府城南二十里的小蒙。再请看《归德府志》卷二十九《祀典》所载的:“庄子庙在府南二十五里小蒙城,今废。旧府志。〔宋〕苏轼



图7 苏轼《庄子祠堂记》碑拓片(局部)

《庄子祠堂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竟始作

祠堂,求文以为记……”。笔者交待:这里所载是苏轼的《庄子祠堂记》全文,共466字,下余的省略了。下面是笔者须要讲明的几个问题了。第一,县令、秘书丞王竟是今安徽省蒙城县宋朝时的县令,并不是小蒙的县令,当时小蒙并不是县。小蒙地属于京西路应天府所辖六县之一的宋城境内。蒙城县则属于淮南东路亳州,是亳州所辖的七个县中的蒙城县。第二,王竟所建庄子祠在蒙城县漆园城遗址,而不是在小蒙。第三,苏轼《庄子祠堂记》碑文,今《蒙城县志》也载有全文,共465字,仅有一字之差,此碑现已于蒙城县庄子祠堂旧址出土。虽仅存186字,前面已讲与《归德府志》、《蒙城县志》所载文同。由此可见,宋州小蒙庄子本邑之说,完全是由蒙城的北蒙附会而来。所谓庄子宋人说也不辩自明矣。

笔者郑重说明的,《归德府志》对庄子故里的记述如此之乱,无论是旧府志、或新府志错都不在撰志之人。古人撰志写书,总爱沿袭旧习,即后人引用前人的所注所语。写府志者也不可能例外。庄子梁国蒙县说错在那里,那就是唐人作《索隐》、《正义》,离不开前朝人的《集解》,作《集解》者也离不开早期学人的论述,就这样由汉刘向《别录》上的“宋蒙人”说,到西晋郭缘生《述征记》上的“蒙县,庄周本邑也”说,越传越讹。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裴骃《集解》引《汉书》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就这样“梁国蒙县”变为成说了,由“梁国蒙县”说又扭曲成“宋人”说。真是一人之错,错之千万人,一时之错,错到千余年。笔者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追念《归德府志》的这位撰志人,当时能够发现庄子宋人说有讹,敢于提出“窃疑周非宋人”的质疑,这种锐敏的客观观察历史,和尊重史实的治学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看来撰志者当时既不敢推翻前人成说,又不愿背心违愿的去引前人所误,大有举棋不定,难于落笔之感,无奈何下只好用“我姑听之”一语而聊以塞责!这是何等高贵的学者风度。

考之正之,庄子生于蒙,或曰北蒙,或曰蒙。尝为蒙漆园吏,有官而不愿做,他的好友惠施也曾请他到过魏国。当时,正是东方大国齐宣

王稷下各派学说鼎盛时期,养士多达千余人,庄子并无问津。楚威王重聘而喻牛辞相。庄子一生,清静淡泊,守道乐贫。他亲身经历了战国争雄、掠夺拼杀、天无宁日的悲惨境遇,迫使他渴望和平、向往自由!寄寓意于《庄子》诸篇。他的

老子故里历(赖)乡和庄子故里北冢是涡水上的两颗东方灿烂明珠,曾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曙光!

本文引用实物资料,承蒙阜阳市博物馆韩自先生,蒙城县文物界同仁的大力支持,特致以感谢。

参阅资料:

- 《史记》
- 《汉书》
- 《资治通鉴》
- 《唐书》
- 《宋史》
- 《水经注》
- 《路史》
- 《中国史稿》
- 《皖志要略》
- 《安徽历史述要》
- 《安徽文物志稿》
- 《文字源流浅说》
-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 《说文解字》
- 《春秋左传》
- 《中国历史地图集》
- 《中国历史年表》
- 《颍州府志》
- 《归德府志》
- 《亳州志》
- 《蒙城县志》
- 《濠州古今》
- 《姓氏考略》
- 《庄子》
- 《殷商文化区域研究》
- 《周原与周文化》
- 《阜阳史话集粹》
- 《高邮名人名胜》
- 《苏轼文集》
- 《中国书法全集》
- 《文物》1987.8
- 《文物研究》五集
- 《东南文化》19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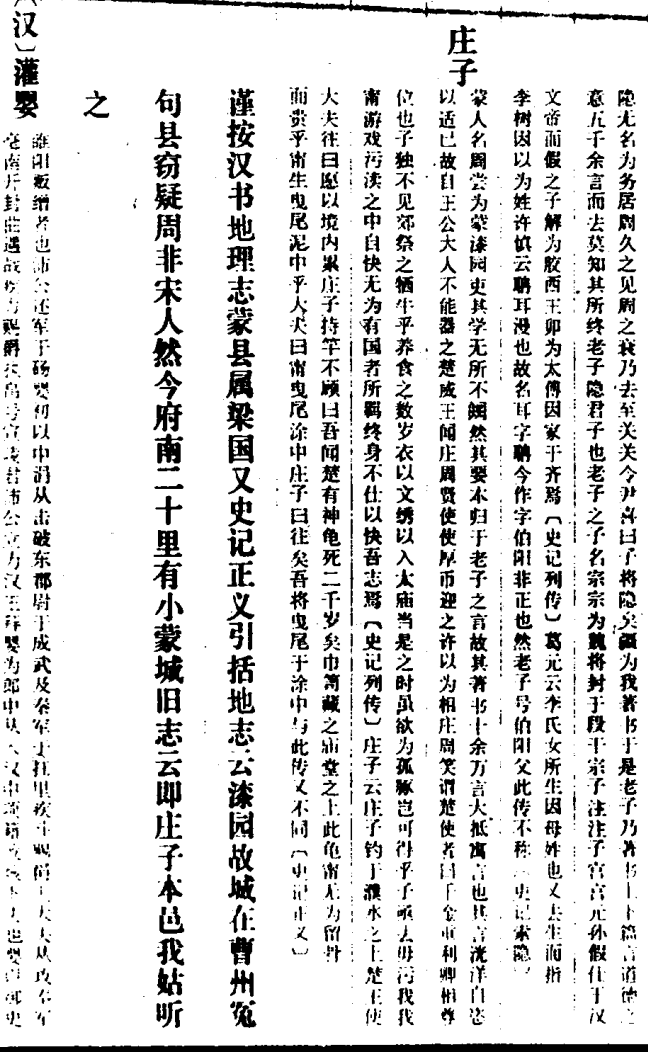


图8 《归德府志》卷二十三

学术思想在中原涡水古文化、商文化的影响下,并融以楚文化;在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进一步发扬光大,奠定了道家文化基础,与老子并列,称为老庄学派。他们的著作《老子》、《庄子》是中华民族哲学史、文明史上不朽的、光华照人的篇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梦里斋居士
丙子年冬至日脱稿